

姜西良◎著

田錫圭譜

姜西良題



嘉賓有星
詩本。綫
似秋天
線如金
留別我，
句句奇
于云起
成峰峦
，宛人
泪珠盈
玉盘。
新若新
花凝宿
露，大
月步
高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014年度北京语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田錫圭譜

姜西良 / 著

姜西良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2015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图号 151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锡年谱 / 姜西良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619-4211-6

I. ①田… II. ①姜… III. ①田锡 (940 ~ 1004) — 年谱 IV. ① 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5969 号

田锡年谱

TIANXI NIANPU

排版制作: 北京创艺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姜正周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子信箱: service@blcup.com

电 话: 编辑部 8610-82303647/3592/3395

国内发行 8610-82303650/3591/3648

海外发行 8610-82303365/3080/3668

北语书店 8610-82303653

网购咨询 8610-82303908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6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PRINTED IN CHINA

序

曾读曾南丰集，见其《类要序》有云：“当真宗之世，天下无事，方辑福应，推功德，修封禅，及后土、山川、老子诸祠，以报礼上下。左右前后之臣，非工儒学、妙于语言、能讨论古今、润色太平之业者，不能称其位。”据其语可知，北宋文臣或新型文儒得以勃兴，实与真宗一朝的政治新修为以及升平的社会环境有紧密关联。

虽然上述数语针对晏殊与真宗之世，但理解稍早的杨亿乃至更早的王禹偁、田锡诸人的崛起，亦皆不能离开太宗、真宗之际政治转型的历史背景。田锡于太平兴国六年和雍熙四年两次上书请东封泰山，即是此一政治转型潮流中的自觉呼应。对辽战事屡次败绩，又有党项僭叛，侵盗宋境，加之一些地区出现叛乱不稳，客观上促使太宗治道发生重大转变，宋初统治者开始推扬清净逍遥的治国理念，由重霸道转向重王道，由承五代之余绪转向构建大宋太平之世。以往我们研究北宋文学，更多是从诗文革新和文人自觉精神的角度去观照，这种目标性、主体性视角不可或缺，但上溯到宋初三朝的政治文化变迁，必然会感到政治修为、礼乐活动同文人崛起、文学兴盛相为表里，而对于这一互动过程的客观描述，有助于理解北宋文化与文学走向繁荣的原因，亦即两种视角可以相得益彰。

姜西良撰著的这本《田锡年谱》，即是以帝王治道、政治环境与个人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全面地呈现了谱主的生平、思想、交游和作为。田锡先人于唐末由京兆避蜀，故其秉承中原故家的流风余韵。田锡虽早年居蜀，但与中朝文臣有深交。三十三岁出蜀后，即与关中、汴洛以及山东文人打成一片。略读田锡《咸平集》即可感到，其俯仰一世，对君王

竭尽忠直，对升平之世充满祈愿。他以西汉文词为宗师，尤慕扬雄、司马相如为文，其士行则以贾谊为楷则，堪称宋代士大夫的一个早期典型。

西良为田锡撰作年谱，实缘于倾慕古贤之道义文藻。犹记得年谱初成约二十万言，此后几年间，西良又旁搜博取相关文献，而归于简核要约，勒成这本精致的小书。书中行文平实，思致有力，或绵密推断，或阙疑不论，即或意犹未尽，也不强作解人，读来每每可喜。谛览此谱，不惟于北宋开国以降四十年政治文学形势可窥豹一斑，亦时时得以指示田锡诗文精美之处，披卷而见其诗如“江上正当摇落景，天涯空惜太平时”“静当细雨初封印，吟对余花自送春”“吟次落花浮砚水，静中飞絮满帘阴”“磬韵似烟和烛袅，松声如雨入窗流”诸篇，则宋初三朝士君子之风流习尚，概可想见矣。

郭 鹏

于农历乙未年仲春

编 例

一、田锡表圣之事迹文学见重于有宋一代，王禹偁称其“未有金谐征贾谊，可无章疏雪微之”（《小畜集》卷七《寄田舍人》），比之于贾谊、元稹，宋真宗称其“得诤臣之体”（《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二十《推恩田锡诏》），杨亿赞其“盖斯文之先觉，实吾道之悬衡”（《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八八《上田谏议书》）。及其歿后，范仲淹、司马光、苏轼先后志其墓铭、作神道碑、序其奏议，皆恨不见其人。其声誉之隆，炳于两宋。惜后世其名渐没。其文集《咸平集》虽传，而其佚者概近十之四五，今所存者，亦非其宋本旧秩。其生平事迹，《咸平集》所附《先君赠工部郎中墓碣》、范仲淹《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本传及诸史杂谈虽有载记，或仅存概要，略其枝节，或间有讹误，失于审辨。本谱之作，旨在纪述田锡一生行实，考察其交游，间及其文学创作、诗文思想。于史籍已有之记载，略者详之，误者正之。纪述、考察，言必有征。

二、本谱对材料之收辑，以细大不捐为原则：披览所及之史籍、文集、方志、笔乘之属，其中凡有涉及田锡之只言片语，均加以钩稽而甄录。不分主辅，唯是为从。

三、田锡作品为考察田锡行实之首要依据。本谱所引《咸平集》以《宋集珍本丛刊》所收明澹生堂钞本为底本，参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巴蜀书社2008年4月罗国威校点本。

四、本谱虽按年月日之先后顺序隶事纪述，然亦兼用纪事本末之体。如平定交州之乱事，自太平兴国五年六月知邕州言交州乱起，至太平兴

国七年三月乱平，历时近两年，其中以田锡谏罢交州之役最为紧要。再如西北边急、西南民乱诸事。凡此之类，皆于谱中原始要终，综贯叙述，不以田锡参与其事之时间为断限，以明田锡于事件本末之独特性和重要性。

五、凡征引之文字，均缩进排比于各条目之下。其排列次序，唯本因事系文之例，不尽以各书著作先后为序。所引亦不尽录全文，但必加引号以标示。条目内容与征引文字全同者，但标其出处于条目之后，并加圆括号以标示，条目之下不复征引。

六、凡征引之文字，或有彼此抵牾难合者，或有文字艰深舛讹者，均附加按语于其下，或阐明意义，或贯串史料，或考辨是非，或补述背景。按语、征引文字、条目分用不同字体、字号，以示区别。凡征引之文字，均详其出处卷次，不避重复，以便读者覆检核。

七、史料时有后书因循前书者。凡征引之文字，若已载于前书，又见于后书，则仅引前书。若后有增益前书之处，则酌情据要征引。

八、本谱正文凡引清及以前书，皆不注作者及时代，以其为学界所熟知也。凡引民国至今著作论文，一般均注明作者。所有征引书目置诸后附“参考文献”之中。

九、本谱正文简称《咸平集》卷三十附田锡所作《先君赠工部郎中墓碣》为《先君墓碣》。简称《续资治通鉴长编》为《长编》。简称《东都事略》卷三十九《田锡传》为《东都事略·田锡传》。简称《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田锡传》为《宋史·田锡传》。《咸平集》卷首附《田司徒墓志铭》乃范仲淹所撰，文字与《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三《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小异，本谱一般征引《咸平集》卷首附《田司徒墓志铭》，简称《墓志铭》，必要处再征《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三《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如“太平兴国五年夏或稍后，田锡自宣州召还，改著作郎”条，《墓志铭》作“著作郎”，《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作“著作佐郎”，故一并征引。

十、田锡年谱类著作旧已成文成书者略为四种：一为马伟《田锡生平述论》（1990年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为孙华《田锡事迹著作编年》

（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三为张胜海《宋初直臣田锡研究》（2006年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四为罗国威《田锡年谱》（2008年巴蜀书社版罗国威校点《咸平集》附录二，亦载于2010年《中国古典文学丛刊》及2010年第2期《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诸文各有优长，然其不足亦显见。本谱于其优长之处，间或采之而不避；于其不足之处，偶亦择要以辨析。其他近年田锡研究之成果，间或论及，以窥当前学界田锡研究之一斑。

十一、关于田锡所授之官职差遣及其交游文学，尚有文献不足征者，或虽有记载，然不足以考辨论定者。如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八日所授之“河北南路转运副使”、十一月二十日叙转之“右补阙”、咸平六年八月六日所授之“右谏议大夫”等，虽反复辨析，仍难定论。田锡与杨亿之交往资料仅存亿之《上田谏议书》，其或有细节，然难以详述。至于《咸平集》所载之诗文书赋等大量篇章，能核定其写作确切时地者，才或半数。因无明文可据，文献不足故也。笔者浅陋，本谱于此类问题，亦谨委曲揣度，以求正于方家，或径阙疑不论，以俟补于后贤。

前言 田锡之政治与文学

历史人物的评价，常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有当世未彰而后代闻名者，有生前彪炳而死后默然者，亦有冠绝当世且流芳千古者。评价历史人物，当据其生平行迹，从不同的时间跨度来做考察，方可做出相对公允的历史评价。宋初历史人物的考察和评价亦当如此。

宋初的田锡（940～1003）大约可算作冠绝当世且流芳千古者。田锡的同代人王禹偁称其“未有金诤征贾谊，可无章疏雪微之”^①，比之于贾谊、元稹，宋真宗称其“得诤臣之体”^②，杨亿赞其“盖斯文之先觉，实吾道之悬衡”^③。其后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名臣大家先后志其墓铭、作神道碑、序其奏议，都对田锡其人、其文及其对有宋一代文学文化的巨大影响赞誉有加，声誉甚隆。后世称誉田锡者代有其人。

田锡一生进谏忠直之言，倡树君子之党，以儒术为己任，以古道为事业，辨明文道，转益多师，觉有宋斯文之先。从宋初三朝来看，他是对唐末五代衰颓之气最早提出批评和变革主张的宋初士大夫之一，也是对其主张最忠实最真切的实践者。从北宋的历史来看，一般认为宋代士风的确立在庆历前后，韩琦称范仲淹“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④，而开辟“天

①（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七《寄田舍人》，四部丛刊影印经锄堂钞本。

②《宋大诏令集》卷二百二十《推恩田锡诏》，中华书局，1962年。

③《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八八《上田谏议书》，参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九三（第十四册，第356—35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④（宋）韩琦《范文正公奏议序》，载（宋）范仲淹著，李勇光、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第32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下正人之路”的范仲淹称田锡为“天下之正人”^①，可见田锡确实为后世士人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司马光、苏轼对田锡亦大加褒扬，促进了北宋中后期正人君子士风的流播与延续，以至于《宋史》论曰：“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②

田锡，原名田继冲，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县）人。据范仲淹《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及《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田锡传》^③，其先世为京兆人，唐末避乱迁蜀中，田锡后蜀广政三年出生时，治蜀者为后主孟昶（919～965）。田锡幼承庭训，读圣人经典，博通群书。乾德三年（965），孟昶降宋，蜀平，宋太祖令宋白（936～1012）宰玉津、杨徽之（921～1000）宰峨嵋，皆厚遇之，为之延誉。后田锡出川来陕，东游长安，与昌黎韩丕复居骊山白鹿观数年，器志大成，遂有声于京师。太平兴国三年（978）秋，以进士甲科第二人及第。释褐除将作监丞，通判宣州，召还改著作郎，俄拜右拾遗、直史馆，赐五品服。出为河北转运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补阙，移睦州。迁起居舍人，还判登闻院，寻以本官知制诰，进兵部员外郎充职。以直言，改户部郎中，出守陈州，以留狱之谤，左降海州团练副使。起为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移户部郎中。至道三年（997），真宗皇帝即位，迁吏部郎中，判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赐金紫。求出典泰州，还台，兼侍御史知杂事，拜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咸平六年（1003）十二月终于私第，享年六十四。

田锡尝自言“天付直性，非苟图名利者也，窃尝以儒术为己任，以古道为事业”^④，《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亦曰：“公动必以礼，言必以

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十三《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载（清）范能濬編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亦名《田司徒墓志铭》，载《四库全书》影印本《咸平集》卷首，两者文字小异。罗国威尝校点田锡所作《咸平集》，巴蜀书社，2008年。以下引《咸平集》皆据罗国威校点本，参以《四库全书》影印本，不俱注。

②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义》，中华书局，1977年。

③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第9787—9792页，中华书局，1977年。

④ 《咸平集》卷三《贻杜舍人书》。

法，贤不肖皆惮服之。出家二十年，未尝趋权贵之门，在贬废中，乐得其心，晏如也。”田锡自白衣，即有意于风化，及登第入仕，屡上疏奏，切谏时务，不以赏赉升陟而骄，不因贬滴废黜而止。一生耿介刚直，忠义方正，其回向三代之心，昭然以并世，其斌斌君子之行，景行于异代。天水赵氏一统海内，重开太平，文人儒士始论以诗书礼乐，再探于性命道德，郁郁乎斯文起，坦荡荡君子行，田锡之功盖不可使黯然淹没。

一、谏忠直之言

五代离乱，世风不古。欧阳修取旨《春秋》，法严词约，自撰《五代史记》^①，尝曰：“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②如五代重臣冯道，历仕四朝，宰辅数帝，自号“长乐老”，当世之士，无论贤愚，皆仰之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叹道：“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③即便是盛赞冯道的《旧五代史》亦论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盖谓此也。”^④质而疑其忠贞之节。故《宋史》总论五代赵宋士大夫忠义名节曰：“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⑤史臣以范质、王溥不能始终于后周，犹有余憾，实与新、旧五代史之叹斥冯道无异。太祖首次所褒

①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欧阳修传》，中华书局，1977年。欧阳修《五代史记》，世称《新五代史》。

② （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中华书局，1974年。

③ （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五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

④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周书》，中华书局，1976年。

⑤ 《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忠义》，中华书局，1977年。

之韩通、卫融，后世亦有质疑其忠义者^①，而田锡、王禹偁以下，其直言说论、名节廉耻，发宋人忠节耿直相尚之韧，肇后世汲汲性命道德之始，盖为定论矣。

田锡幼即聪悟，好读书属文。^②其父田懿善教于家，尝命田锡曰：“汝读圣人之书，而其道慎无速，为期二十年，可以从政矣。”^③又曰：“观尔之性，必光大吾门也，当立身扬名，勉副吾望乎！”^④田锡服其训拳拳然，博通群书，又东游长安，学于骊山白鹿观数年，器志大成。《宋史》载其“好言时务，既居谏官，即上疏献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疏奏，优诏褒答，赐钱五十万。僚友谓锡曰：‘今日之事鲜矣，宜少晦以远谗忌。’锡曰：‘事君之诚，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岂为一赏夺邪？’”^⑤《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七所载太宗《答田锡上疏玺书》有言：“田锡所上书言事，陈古讽今，有犯无隐。居责言之地，不为从谏；得争臣之风，深所嘉尚。然邦国之事，朕虑之甚熟，至于兴师伐叛，庀徒授役，皆有理而为之，且非无名之举也。……自今有所见闻，无辞献替之任，盖出于朕意，进思尽忠，勿旷于汝职，故兹诏示，式嘉乃诚。”^⑥《咸平集》卷三十附《先君赠工部郎中墓碣》所载大意略同。田锡上疏时为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四十二，进士及第凡三年，卢多逊为相。《长编》卷二十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壬寅”条载“按：锡为谏官几一年，盖未尝言事，诣阊门一再所献，皆歌颂盛德耳。至是始敢直言，故其升平感遇诗云‘皂囊初上聊供职’也。为谏官几一年，事之可言者固多矣，而多逊逆闭其途，虽有章疏亦不得通，非因出使入辞，实封直进御

①（清）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第3—4页，中华书局，1964年。王夫之批判冯道、范质辈之不忠一如欧阳修，而有甚于《宋史》。其论韩通虽不可言周之忠臣，而尚可谓为“有生人之气存焉，与之有恒可矣”，实为不易之论。

②《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田锡传》，中华书局，1977年。

③（宋）范仲淹《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载范仲淹著，李勇光、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第31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咸平集》卷首附范仲淹《田司徒墓志铭》。

④《咸平集》卷三十附《先君赠工部郎中墓碣》。

⑤《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田锡传》，中华书局，1977年。

⑥《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七《答田锡上疏玺书》，第683页，中华书局，1962年。

座，则虽太宗之圣，终亦不闻此也。呜呼，奸臣之蠹国，岂不甚哉！”可想当时奸相蔽明主之深、良臣进忠言之难，亦可见田锡诤臣事君之诚，开忠谏之风而不失谏臣之体，田锡因此而得褒奖。

自此至咸平六年（1003）田锡卒，凡二十余年，田锡出入迁陟，宦海浮沉，始终不改其直言忠谏之心。《长编》卷五十五“咸平六年十二月辛未”条载：“辛未，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田锡卒。锡耿介寡合，严恭好礼。居公庭，必危坐终日，未尝懈容。慕魏征、李绹之为人。及居谏署，连上八疏，皆直言时政得失。尝曰：‘吾立朝以来，封疏五十二奏，皆谏臣任职之常也。言苟获从，吾幸大矣，岂可藏副示后，谤时卖直耶？’悉取焚之。临终，自作《遗表》，犹劝上‘以慈俭守位，以清静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乱’。”今《咸平集》卷二十五《遗表》曰：“伏望陛下以慈俭守位，以清净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乱，与宗庙社稷为福，与天下亿兆为主。”其念国忘家、有公无私，当世或唯有王禹偁可得其仿佛。^①苏轼撰《田表圣奏议叙》比之汉臣贾谊，曰：“方汉文时，刑措不用，兵革不试，而贾谊之言曰：‘天下有可长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后世不以是少汉文，亦不以是甚贾谊。由此观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当如是也。……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来世不有若偃者举而行之欤？愿广其书于世，必有与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②东坡之生距田锡之生几近百年，而犹惜其言之未尽行，叹其忠臣孝子之志。东坡谥文忠，宋世之忠臣也，以东坡之忠而仰慕田锡之忠直君子若此，则田锡果何人哉？

二、树君子之党

在历经唐季五代荡乱之后，士夫文人重新开始思考如何可为正直君子，如何建立不朽功业。田锡《咸平集》卷十一《直论》曰：

① 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咸平三年十二月”条按曰：“禹偁《小畜集》内不收直谏之疏，殆与其友人田锡用心相似。”见徐规《仰素集》第231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田表圣奏议叙》，中华书局，1986年。《咸平集》卷首附《咸平集原序》。

《春秋》曰：“子好直言，必不免于难。”又曰：“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也。”……然在中人，慕为君子，惧抗直之贾祸，因踣躅于为仁，得不较论以进为直之心乎？……以是知不独直于言辞，以构祸难，直于为道、直于为仁，虽圣人犹不免疑，况他人乎？

认为《春秋》之旨在于使人直言，同时自免于难。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

《直论》又曰：“夫君子之直，以智济之。”田锡所以能始终持耿介之节，谏忠直之言，在于其“直以守道于内，智以济直乎外”。

然田锡所谓“智”者何？《咸平集》卷十三《守默箴》曰：

惟天之默，三辰灿然。惟地之默，万物生焉。君子之默，百行昭宣。……夫事有节，而理有机，机赴节会，一言众怡。所谓时然后言，敢忘圣人之规？

劝君子善于守默，见机赴会，因时而言。然而在宋初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下，守默罕言，岂不免君子之诮，岂不失文明之时？《咸平集》卷三《答何士宗书》曰：

管子曰：“无翼而飞者，声也；不根而固者，情也。”哲人交结之旨，尺书邀激之辞，吻合于心，适令得志，况今主上以文明之道化四海，良相以清静之理育万方，卿大夫以名节相高，士君子以儒雅取进。钟是鼎新之运，乐乎升平之时，苟不左交英豪，右结俊造，与振藻名场之会，陪鸣珂帝里之游，则亦是包羞，安能免诮？

由此，田锡便提出了“树君子之党”的主张。

《咸平集》卷四有田锡《贻青城小著书》，为其未出蜀时，希慕当时青城小著^①之德风，相投以求定交之书。其言曰：

弘农杨公徽（之）、安定梁公周翰、广平宋公白，皆博我以雅道，勉我以大来矣。今窃聆高义，欲伸于足下，……足下登进士第，升拔萃科，出为青城佐，将来为达官享大位，岂不从今日树君子之党，济他日之志乎？若使小人得志，擢吾侪于下位，虽有国士慷慨之志不得伸，虽有忠臣蹇谤之心不得用，道孤党削，则足下以为何如？锡已定交于向者三君子矣，今又伸志于足下，庶使我忠壮朋党久大，器业得全矣。

① 张胜海硕士学位论文《宋初直臣田锡研究》第6页以此“小著”当为宋瑋，是。

杨徽之、梁周翰、宋白皆宋初闻人，以文名知于当时。《宋史》卷二九三田锡本传曰：“杨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为之延誉，繇是声称翕然。”杨、梁、宋在蜀延誉田锡时皆已有名于朝野。田锡厚遇于此三人，可谓受知于时，又伸志于宋瑋，欲“树君子之党”，“使我忠壮朋党久大，器业得全”，可见田锡“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行之笃。^①

《贻青城小著书》又引史为例，证君子或为党或无党之成败得失：

昔魏征得房玄龄、杜如晦为党，所以成贞观之业；姚元崇得宋璟为党，所以致开元之化；裴度无党，为中人魏宏简、词臣元稹排之；韦贯之无党，为张宿诬之。锡每读唐史至此，未尝不慨然兴愤。

以史为鉴，田锡欲追复李唐之功业，必欲天子得良相贤臣，树君子之党。《咸平集》卷十三《相箴》序曰：“昔玄宗用姚崇、宋璟，则开元之初，天下康济；用林甫、国忠，则天宝之末，海内丧乱，岂独臣之过也？抑亦君心之怠也。”以“性习相近，始终勿渝。进贤为党，道则不孤。至公为任，身则无虞”谏天子当勤政不怠，精求良相，良相应广进贤臣，以至公为任，树君子之党，则道不孤、功可成。

君子无党既不可，而党非其人亦不可。《咸平集》卷十八《辨惑篇》曾曰：

春树桃李，美果终得尝。莫树枳与棘，芒刺还相伤。君子所树党，在择贤与良。其党苟非人，为祸亦自殃。蓄者本铅刀，用欲如干将。蔡者本款段，骋欲侔骐驎。辨之胡不早，坚冰自履霜。

所谓“其党苟非人”，非人即非君子，则其党即非君子之党，而为小人之党。虽未明言，意在其中矣。其后，王禹偁作《朋党论》^②，继田锡“君子之党”立论，辨君子小人朋党之异，其嗟问“又谁咎哉？又谁咎哉？”与田锡《贻青城小著书》所言“岂独臣之过也？抑亦君心之怠也”恰似一问一答，君主天子若闻此直言，若纳此忠谏，则不负良臣之心矣。

① 参本书“田锡年谱”乾德三年、乾德四年记事。

② 据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王禹偁作《朋党论》在端拱元年（988），在田锡作《贻青城小著书》言欲“树君子之党”之后二十余年。参徐规《仰素集》第132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咸平集》卷三《贻梁补阙周翰书》言：

近世仕进之子，不敢历公卿士大夫之门，虑涉嫌疑于栽培之地，而耦俱生谤，设使负非常之才，有非常之名，彼世疑俗嫌，又何畏忌违去之有哉？必若伏奏于丹墀之下，导扬其名于天子，使赫然超拔。虽谗慝之口，欲疵疠设訾于正人哉？岂徒涉猜履谤而已。使其人为囚奴，为俘虏，为负贩，为仇雠，而道有可贵，尚当哀穷悼屈，洗磨振擢，趣其亟也，若濡救焚灼，提引沦溺。况冠儒之冠，服儒之服，与群俊俯仰耀广场之风采，而不敢挺然与之为远蹊，则岂惟负于才良，其实负于邦国也，其次负于己心也。道出太祖一朝^①仕进之子虑涉朋党之名，纵其道有可贵，亦不敢如唐之士人，自投于公卿士大夫门下。而田锡之所以敢冒险而为，在于其“志有所自守，迹有所自明，必也跻一第，拜一命，庶几无忝于时，无愧于心”^②，所守者仁义之道，所秉者忠信儒术，所为者光明磊落，故不惧于时风，而敢挺然寻求远蹊。王禹偁作《朋党论》同年（988），又作《上史馆吕相公书》上宰相、国史监修吕蒙正，中言：“今馆中之士，先进者有若金部员外郎安德裕、左司谏兼直秘阁宋泌，皆砥砺名节，老于文学。俾之修撰，舆论归焉；其于后进士数辈，不敢自炫，虑有朋党之刺也，在相公熟参之。”^③则太宗时士人犹患朋党之讥，而未敢有朋党之论，虽“砥砺名节，老于文学”之士亦未能免。反观田锡，十数年前即欲树君子之党，济他日之志，以斥小人而行古道，振逸民而理天下，则田锡立言之勇、树党之切，远过于时人可知也。

而田锡“君子之党”之意义不唯如此。范仲淹为有宋一代名臣，高风亮节，然亦被后人如王安石等指责结党坏俗：“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④范仲淹与梅尧臣曾为好友，梅尝劝其勿树党以自高，

① 《咸平集》卷三《贻梁补阙周翰书》，田锡自言“自十有五志于学，逮今二十年”，则作是书时，田锡年三十五，时为太祖开宝七年（974），《四库全书》影印本。参本书开宝七年记事。

② 《咸平集》卷三《贻梁补阙周翰书》。

③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八《上史馆吕相公书》，四部丛刊影印经钏堂钞本。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五，中华书局，1995年。

范回应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①其志趣口吻均颇近田锡。欧阳修亦撰《朋党论》，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盛赞“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认为君子之朋当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②欧阳修“朋党论”可谓直承田锡“树君子之党”，愈发挥愈酣畅，此后仁宗、神宗两朝士人君子结党，蔚成风尚，有宋士风亦因此而渐成气候。

田锡虽数言欲“树君子之党”，终因当时士风浮薄，未得遂愿，又籍其生性耿介刚直，志在古道，故而终其一生，仕途浮沉，而少有结党之迹。^③真宗圣旨尝评田锡曰“其人介然，别无朋党”，令“有可奏之事，但上实封，以广朕之闻见”，可见真宗对田锡言辞之器重。^④亦可知田锡虽希冀“君子之党”，却未能逃离宋初“虑朋党之刺”之政治现实。

三、复儒术古道

田锡在提出“树君子之党”前，又提出士大夫应以儒术为己任，以古道为事业，树君子之党，使天下复归古道。《贻青城小著书》描述其交友之准则，展其志向曰：

锡每读圣人之书，慕君子之行，正直自守，耿介独立。非有好古博雅之道，纯信英特之气，锡则视之蔑如，非吾侪也。……且士大夫所贵者树德而亲仁，博学以师古，师得古道以为己任，亲乎仁人以结至交。至交立则君子之道胜，胜则可以倡道和德，同心为谋，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复归于古道。

①（宋）范仲淹《灵乌赋》，载范仲淹著，李勇光、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第9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参刘子健《梅尧臣〈碧云暇〉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载刘子健著《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03—1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②（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之《居士集》卷十七《朋党论》，四部丛刊本。

③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考述以胡旦、田锡、赵昌言、冯拯等人为代表的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与宋初朋党政治的关系，力图描述田锡在太宗、真宗两朝的政治活动，可参看。

④《咸平集》卷二十七《谢圣旨许谏事》：“右臣前月二十八日，长春殿伏蒙圣慈宣喻臣昨所奏之事：‘朕一一披览，又以其人介然，别无朋党，可耳仍旧令臣知之，即不得泄漏’者，兼再奉圣旨‘有可奏之事，但上实封，以广朕之闻见’。”